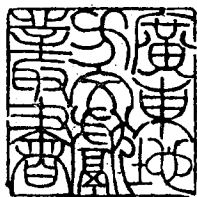




黃遵憲詩選

钟贤培 管林
谢华 汪松涛
选注



黄遵宪诗选

钟贤培 管 林 选注
谢 华 汪松涛

广东人民出版社

黄遵宪诗选

钟贤培 管林 选注
谢华 江松涛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75印张 3 插图 313,000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册

书号10111·1461 定价2.80元

前 言

黄遵宪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期间的著名活动家、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卓有成就的诗人。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当时及后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一）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还曾署过“东海公”、“观日道人”、“法时尚任斋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布袋和尚”、“公之它”、“老少年国之老少年”、“岭东故将军”、“拜鹃人”等名号，广东嘉应州（今梅县市）人。出身于由“典肆”致富的官僚地主家庭。父亲曾任户部主事、知府等职。黄遵宪于同治六年（二十岁）入州学，同治十二年（二十六岁）考取拔贡生，光绪二年（二十九岁）参加顺天乡试，被录取为第一百四十一名举人。翌年，跟随何如璋东渡日本，任清政府驻日使馆参赞。光绪八年（1882），调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四年后，辞职归家，撰修《日本国志》。光绪十六年（1890）跟随薛福成赴英，任驻英使馆二等参赞，二年后调任新加坡总领事。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爆发，他奉调回国，在张之洞幕下主持江宁洋务局。黄遵宪在国外工作了十多年，表现了他的外交才能，为了维护中国主权，为了保护华侨的正当利

益，以及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同时也使他有机会直接了解日本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这对他的思想变化起着促进作用。从新加坡回国后，他积极参加康有为在上海组织的强学会的活动。强学会被迫解散后，他发起创办《时务报》，聘梁启超为主笔。《时务报》是当时改良派在南方的主要宣传阵地。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于翁同龢的举荐，出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并署理湖南按察使。在湖南期间，他在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积极推行新政，扫除积弊。这是改良派于戊戌变法之前在一个省范围进行新法的尝试。一年后被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未赴任而戊戌变法失败，卒被解职放归。光绪三十一年（1905）死于家乡，终年五十八岁。著有《入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及《日本国志》等。解放后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将他的已删诗稿和未定稿，以及散见于报刊的诗搜集成册，于1960年出版《入境庐集外诗辑》。

黄遵宪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人民反清斗争和反帝斗争走向高涨的年代。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资本主义列强继鸦片战争之后，接连发动多次侵华战争，而清政府却屈膝投降，割地赔款，中国面临被瓜分的严重民族危机，而以义和团为标志的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也进入空前未有的高涨时期。与这种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相适应，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潮和民主革命思潮相继兴起。黄遵宪象历史上进步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一样，他不满社会黑暗、政治腐败，忧虑民族危难，要求变法图强。他的《入境庐诗草》的开卷诗就表现出“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的思想，提出“惟念大乱平，正当补弊偏”的变法主张。

如果中国没有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变化，没有他外交工作的际遇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黄遵宪走的仍然是“兴邦济世”、“尊王攘夷”的地主阶级革新派的道路。出使日本初期，这种浓厚的封建主义思想就表现很突出。他鄙夷当时日本朝野向西方学习的热潮，斥责西方“国政共主之治，民权自由之习”^①的社会制度，认为向西方学习的是技艺之学，而封建社会的“伦常纲纪”，则“不可得而变革”^②。光绪五年（1879年），黄遵宪在日本与王韬订交。王韬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在政治上主张效法英国，搞君主立宪，在经济上主张开发矿藏，发展有利于民生的近代工业。黄遵宪与王韬接触虽然时间不长，但王韬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大约是与王韬订交的第二年，即光绪六、七年间，黄遵宪开始接触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著作，思想受到更大震动，“心志为之一变”^③，认识到：“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④，十分肯定地说：中国一定要变，“中国必变从西法”^⑤，而“太平世必在民主”^⑥。也就在这时候，他开始撰写《日本国志》，希冀“借鉴邻国，作匡时之策”^⑦。

黄遵宪出使日本，这是他的思想向资产阶级改良派转变的重要时期。这时他不仅从树人方面明确地提出了“师四夷”^⑧的思想，而且主张学习美国的共和政体，认为美国“民主立国，共和为政”，“不贪人土地，不贪人人民，不强与他人政事”^⑨，是一个真正理想的“太平世”。可是，他离开日本，出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后，就遇上了美国资产阶级大规模排斥和虐待华工，接着又亲眼看见总统选举的闹剧，这使他从美国的社会现实中看到了“官吏之贪诈，政治之秽浊，政党之横肆”^⑩，使他原先向往美国共和政体的思想“爽然自失”，发出“文明大国尚如此，况民

智未开者乎”^⑪的感慨。于是，他的思想从“民主共和”转到“尊君权，导民权”的君主立宪上去了。后来他坚决辞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职务，回国专心致志于续写在日本撰写未竟的《日本国志》。就是在这种思想驱使下，他借日本史的研究，以明治维新为镜子，为清政府开具“君主立宪”的治国良方。如果说《日本国志》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黄遵宪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政治要求，那末，他回国后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施行新政，就是他的改良思想的实践，是戊戌变法前在一个省里改革政治的可贵尝试。黄遵宪是湖南实施新政的重要筹画人，当时湖南实行的十二项新政的设施中，由他主办或参预的就有保卫局、迁善所、整顿刑狱、课吏馆、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馆等项。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仍然“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⑫，念念不忘国事。他不怕清政府的政治迫害，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保持密切的书信联系；在这时期写的十余万言的通信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也表现了他对维新变法的锲而不舍的斗争精神。但必须指出，戊戌变法失败后，时代已经提出了彻底推翻清朝卖国政府的任务了，黄遵宪却未能跟上时代的潮流，与康、梁一道，固守“君主立宪”的藩篱，提出“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的主张，坚持与清政府“调和融合”的保皇道路，这是应予批判的。

(二)

“穷途竟何世，余事作诗人”^⑬。黄遵宪一生，“不屑以诗人自居”^⑭，然而，诗却是他一生成就最大的方面。

黄遵宪现存的诗，计《入境庐诗草》六百余首，《日本杂事诗》二百首，此外，解放后出版的《入境庐集外诗辑》收录

了二百余首：大部分是诗人晚年对《人境庐诗草》定稿时删去的作品，小部分是散见于晚清报刊或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的作品。

反对侵略，反对投降，这是黄遵宪的诗的最突出的方面。他的作品，形象地记录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国家、民族被外国殖民主义者欺凌、瓜分的屈辱的历史，反映了近百年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反对投降的英勇斗争，也表现了诗人反对侵略，反对投降的高风亮节和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情怀。

黄遵宪的诗，把我们带回到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备受欺凌侮辱的历史中去。诗人在《香港感怀》诗中，回顾了鸦片战争割地赔款的屈辱历史，也看到香港自沦为殖民地后成了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烟的集散地，成为威胁广州，侵略中国的桥头堡等等的变化，悲愤莫名。“弹指楼台现，飞来何处峰。为谁刈藜藿，遍地出芙蓉。”“帆樯通万国，壁垒逼三城。虎穴人雄据，鸿沟界未明。传闻哀痛诏，犹洒泪纵横！”这些诗句充分表现了诗人维护主权，反对侵略的鲜明的爱国立场。黄遵宪因参加科举考试，先后到过广州、天津、北京等地。在广州，他热情地讴歌鸦片战争时坚守虎门，抗击英军而英勇殉难的水师提督关天培的爱国壮举，猛烈抨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割地求和的卖国行径与不战失城的两广总督叶名琛的懦弱无能（《羊城感赋》）；在天津，他想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侵略者的军舰威逼天津的情景，可是，“平平海已不扬波，中外同家久议和”，这些令诗人“首频搔”的屈辱往事，在天津却事过境迁了，诗人无限感慨：“地到腹心犹鼾睡，人来燕赵易悲歌”（《由轮舟抵天津作》）；到了北京，目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残垣断壁，悲愤地说：“七万里戎来集此，五千年史未闻诸”，希望清

政府能象越王勾践一样，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雪耻图强：“教训十年民力盛，倘排犀手射鲸鱼”，把帝国主义列强赶出中国领土（《和钟西耘庶常德祥津门感怀诗》）！在《述怀再呈鬻人樵野丈》中，批判的锋芒还指向当时正在肢解我西北领土的沙俄军事帝国，并清醒地指出帝国主义者都是一群欲壑难填的恶狼，他们“今年问周鼎，明年索赵璧，恫疑与虚喝，悉索无不力”，只有加强战备，巩固国防，用武力才能驱赶侵略者。

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这场战争，清政府向日本侵略者屈辱投降，彻底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朽无能和卖国的反动面目，从此帝国主义列强也更加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迅速掀起一个“瓜分大清帝国”的狂潮。在如何对待这场战争及战争后的形势变化的问题上，统治阶级内部以帝后党争的形式展开了一场爱国与卖国的激烈斗争。中日战争爆发时，黄遵宪在新加坡任总领事，不久，他奉调回国，任江宁洋务局总办。他始终关注着这场战争，陆续写下了《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降将军歌》、《度辽将军歌》和《台湾行》等感人肺腑的反侵略的爱国诗章。在这些作品里形象地体现了诗人反对日本侵略，谴责清政府顽固派屈膝投降和为祖国危亡担忧的爱国主义感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民维护主权，反抗侵略的英雄气概。

中日战争后，从德国强占胶州湾开始，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开始了。黄遵宪后期的诗歌，比较突出地反映和谴责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情况，流露出对国家衰亡、山河缺损的愤慨和忧伤。这期间的作品如《赠梁任父同年》、《上黄鹤楼》、《上岳阳楼》、《长沙吊贾谊宅》、《书愤》等，为民族、

国家前途担忧的炽烈程度已到了伤时感事、睹物生情的地步。更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在诗中还对造成民族危难、领土支离局面的根源进行深刻的剖析，矛头直指清朝统治集团：“岂欲亲豺虎，联交约近攻。如何盟白马，无故卖卢龙。一着棋全败，连环结不穷。四邻墙有耳，言早泄诸戎。”^⑩诗人毫不隐讳地自注：“光绪二十二年使俄密约已以胶州许之。”这是指李鸿章受贿卖国之事。当时李鸿章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收受了三百万卢布的贿赂，从而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把整个东北地区占地筑路的特权奉送给俄国。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清朝卖国政府，指向以慈禧、李鸿章为首的亲俄派鼓吹“联俄制倭”的卖国行径。黄遵宪不畏权势，秉笔直书，其胆识与洞察力是令人钦佩的。

《逐客篇》、《番客篇》、《罢美国留学生感赋》等几首以华侨或留学生为题材的作品，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诗人的爱国主义热忱。在这几首诗里，他颂扬了华侨热爱祖国的爱国心，也热切地同情华工、华侨受外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屠杀、斥逐和虐待的悲惨遭遇，揭示了没有强大祖国做后盾致使华侨备受欺凌的社会原因，清政府官员驱赶留学生回国的愚蠢无知和刚愎自用的做法，诗中也作了揭露和鞭挞。

批判守旧，要求变法，救亡图存，这是黄遵宪诗歌另一重要内容。但是，在他的诗集里，反映变法思想的诗，大多写于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而且侧重于反映变法与反变法这场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顽固派的激烈斗争。

《感事》是黄诗中完整地记叙戊戌政变的组诗。戊戌政变，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同地主阶级顽固派的第一次较量。在这场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以慈禧为

首的顽固派残酷地镇压了维新派，幽禁光绪皇帝，慈禧也从此再度临朝执政。这次政变不仅捕杀了维新派的“六君子”，而且株连甚广，凡与新政有点牵连的，杀戮、监禁、流放以及革职，无所不用其极，“可怜时俊才无几，瓜蔓抄来摘更稀”，一时京城风声鹤唳，人人自危。诗人也身受其害。但黄遵宪并没有在顽固派的残酷镇压面前屈服，他在写于南归途中的《感事》里，痛骂泄谋告密的袁世凯为“两端首鼠”，斥责顽固派为“贼”，他猛烈抨击清朝统治者残酷镇压维新派的血腥罪行，也想起维新派被残酷镇压后清政府在政治上更加堕落的现实，“穷途并哭海漫漫”，伤心的泪水奔突而出。这类题材的作品，比较突出的还有《己亥杂诗》、《五禽言》、《仰天》、《雁》等。这些作品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改良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也表现了诗人坚持革新的改良思想和对顽固派的憎恶的感情。

“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⑩将日本、东南亚及欧美等国的政治、历史、科学文化和风物入诗，这是黄遵宪诗歌内容的另一突出表现。读这部分诗，读者如置身于奇异的世界之中，可以看到“一逢锦绣游人路”的日本樱花（《樱花歌》），“举国沉迷同失日”的伦敦大雾（《伦敦大雾行》），“拔地崛然起，峻峰矗百丈”的巴黎铁塔（《登巴黎铁塔》），“一河横跨两洲遥”的苏彝士运河（《苏彝士河》），“瘦菊清莲艳桃李，一瓶同供四时花”^⑪的新加坡四季如春的迷人景色……。《日本杂事诗》内容尤为广泛，从日本的远古传说到明治维新，从山川景色、风土人情、文化教育到源远流长的中日文化交流，诗中都有反映。《日本杂事诗》是以竹枝词的形式写的历史组诗，同时又是一曲别开生面的中日文化交流的颂歌。“海外遗民竟不归，

老来东望泪频挥。终身耻食兴朝粟，更胜西山赋采薇。”歌咏的就是明末清初东渡日本，对日本文化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深受日本人民尊敬的明代学者朱之瑜。

尤为难得的是，在他的诗集里出现了歌颂西方自然科学的诗，在诗中大量运用了如地球、国会、动物、植物、影戏等新名词，这些作品不仅表现了新的科学知识，更主要的表现了当时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思潮，是诗人“师四夷”、救中国的思想在诗中的反映。被推为“千古绝作”^⑬的《今别离》，是这类诗歌的代表。诗中写了代表当时西方自然科学水平的轮船、火车、电报、相片以及关于地球的学说等。

黄遵宪的诗，记叙了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过程，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时代脉搏，也表现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当然，黄遵宪的诗，正如他的思想一样，并没有超越历史所许可的范围，表现出明显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黄遵宪诗中的思想局限突出地表现在对待人民群众这一个尖锐的问题上。我们必须看到，黄遵宪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顽固维护清朝政权，坚决反对人民革命斗争的封建官僚。他不仅早年就攻击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晚年在《述闻》、《天津纪乱十二首》、《聂将军歌》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一系列诗作中，又把义和团与帝国主义并列在祸国殃民的仇敌位置上，而且把帝国主义侵略的起因归之于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义和团被污蔑为拳匪、贼、遗孽等等，认为这是自“发匪”、“捻匪”、“教匪”之后又一次浩劫。这充分暴露了黄遵宪仇视人民革命斗争的地主阶级立场。至于把中国人民看作是愚民，在黄诗中则更比比皆是了，例如在《纪事》中，他揭露美国总统选举的丑闻，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

但用意却在于说明，象美国这样一个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尚且选举总统弊端百出，而中国还是一个“民智未开”的国家，那更是断断乎不能实行的，从而得出“共和政体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⑩的结论，暴露了黄遵宪对人民鄙视和恐惧的心理状态。

黄遵宪要求改革政治，救亡图存的思想始终没有动摇过，就是晚年隐居乡间，表面上“闭门著书，不预世事”，实际上仍然非常关心时局的变化。他家中就挂着兴中会会员谢缙泰绘制的时局全图。在这张时局全图上，有这样的题词：“沉沉酣睡我中华，那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黄遵宪在家中挂着这样一幅地图，“仰天击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君主立宪”的思想却象一条绳索紧紧地束缚着他的思想，他在诗中始终寄希望于光绪帝的复辟上，甚至对曾经被他诅咒过的慈禧太后也存在幻想。他在《庚子元旦》中说：“喔喔天鸡又一鸣，双悬二曜展光明。承天仰看金轮转，震地讹传玉斧声。”他希望在光绪、慈禧这两个“太阳”的照耀下，能见到太平盛世的到来。就是在他那些批判顽固派的诗中，也可以看出其对皇室不争气的哀怨和规劝的情思。这是黄遵宪的人生悲剧，也是改良派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不能适应时代的洪流，终于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的时代悲剧。

（三）

黄遵宪的诗，崛起岭南，蜚声域外。他的作品，不仅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民族灾难和风云变幻，在艺术上也“熔铸百家，斟酌乐府”^⑪，独辟境界，给古典诗歌开拓了一个新天地。

黄遵宪诗歌的最大特色，首先表现在题材问题上。他继承

我国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选取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的政治题材，熔铸为历史性的诗章。在他现存的一千多首诗中，除《日本杂事诗》是以诗纪史，综论古今的历史性组诗外，纪时事或与时事有关的作品达五百余首，而且这类作品，不少用长篇歌行体或以近体感事组诗的形式来写，并且正如他自己说的“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入诗”，这就使他的作品，不仅政治倾向性很强，而且“史”的气味也甚浓。近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义和团运动等，都在他的诗中有所反映。例如关于中日战争的诗，他前后共写了十多首，在这些洋溢着反帝爱国的诗里，它真实地记述了平壤战败，旅顺陷落，大东沟、威海海战败绩，北洋水师覆灭，清政府终于屈辱投降，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等中日战争从发生到结束的全过程，日本侵略者的侵略野心，清政府顽固派的妥协投降，清朝军队一触即溃，爱国官兵和人民的英勇反抗，以及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等，都一一在作品中得到反映。又如关于戊戌变法的诗，康、梁等发动维新变法，帝党与后党在变法问题上的激烈党争，戊戌政变以及后党对帝党的镇压等，都作了形象的叙述，不仅反映了诗人鲜明的爱憎，而且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有人说：“近数十年来，能直言眼前事直用眼前物，莫如黄公度遵宪。”^②这是恰如其分的。

富于形象性是黄遵宪的诗的另一特色。他的作品，无论古体诗还是近体诗，图状山川，记叙时事，形象感都比较强烈。如《五月十三夜江行望月》：“洒泪填东海，而今月一圆。”诗人行舟东海，仰望圆月，想起了祖国领土支离破碎的厄运，台

湾人民被屠杀的殷殷血痕，滔滔东海，盛不下诗人悲伤的泪水，明月当空，更能勾起思念台湾的骨肉之情。诗人强烈的爱国精神，形象地体现在富于形象感的诗句里。爱国诗人海上行吟的形象也矗立在读者心中。

黄遵宪的长篇叙事诗尤其富于形象性。在这类作品里，诗人不仅善于写景抒情，更善于直接刻画人物，通过人物形象来体现诗的中心主题。在他的诗中，有慈祥的老人，也有天真活泼的儿童，有保卫祖国、反抗侵略的爱国将领，也有威震敌胆、为国捐躯的抗敌英雄；诗中也塑造了一些卖国求荣的民族丑类。诗人在刻画人物时，善于用细腻的笔触，通过一些符合人物身份而又富有典型性的情节，来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如写儿童：“上树不停脚，偷芋信手爬。昨日探鹊巢，一跌败两牙。嚔血喷满壁，盘砖画龙蛇。兄妹昵我言，向婆乞金钱。直倾紫荷囊，滚地金铃圆。”（《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寥寥几笔，一个天真、顽皮而又聪颖的儿童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冯将军歌》中冯子材的形象，也很有特色。诗中有意识地运用《史记》中写传记的一些手法，前后连续十六次迭用“将军”二字，一个反侵略的爱国将军的雄姿也在这些迭用“将军”的句子里形象地突现出来。又如《降将军歌》中的投降者：“我军力竭势不支，零丁绝岛危乎危。龟鳖小竖何能为，岛中残卒皆疮痍。其余鬼妻兵家儿，锅底无饭枷无衣。纆干冻雀寒复饥，五千人命悬如丝。我今死战彼安归，此岛如城海如池。横排各舰珠累累，有炮百尊枪千枝，亦有弹药如山齐，全军旗鼓我所司。本愿两军争雄雌，化为虫沙为肉糜，与船存亡死不辞。今日悉索供指麾，乃为生命求恩慈。指天为正天鉴之，中将许诺信不欺。”通过对投降派在日寇面前哀怜乞降的描写，一个出卖

民族利益，无耻向敌人乞降的民族败类的卑劣灵魂形象地勾勒出来。

黄遵宪诗歌的语言风格也别具一格。我们知道，改良派新诗经历过一个“颇喜捭揅新名词以表自异”的阶段。梁启超指出：“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捭揅新名词以表自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慕嗜之。此八篇中尚少见，然‘寰海惟倾毕士马’已其类矣。其《金陵听说法》云：‘纲伦惨以喀斯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喀斯德即Caste之译音，盖指印度分人为等级之制也；巴力门即Parliament之译音，英国议院之名也。又赠余诗四章中，有‘三言不识乃鸡鸣，莫共龙蛙争寸土’等语，苟非当时学者断无从索解，盖所用者乃《新约全书》中故实也。其时穗卿尤好为此。穗卿赠余诗云：‘滔滔孟夏逝如斯，亶亶文王鉴在兹。帝杀黑龙才士隐，书飞赤鸟太平迟’，又云：‘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徙’。此皆无从臆解之语。当时吾辈方沉醉于宗教……，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②如果说在理论上比较中肯地指出新派诗的缺点的是梁启超，那末，在创作实践上开新派诗新诗风的当推黄遵宪。他的诗，词汇取材范围很广，“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无所不取，而且大胆地运用新思想、新名词、新材料入诗，所谓取“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象地球、留学生、赤道、国会等古典诗词中从未有过的新名词，都在他的诗中出现，而且不显得生硬造作。在一些实践他的“我手写吾口”的诗中，运用方言口语，语言通俗显浅，近似民歌。一些古体诗，如《度辽将军歌》，诗中描写吴大澂狂妄无知，利欲熏心，虽然有几处用典，但并不难懂，就是不知道典故的出处，也不难了解它的意思；语言

朴实自然，平易显浅，显示黄诗口语化的倾向。《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在吸取汉乐府和民歌养料，形成语言通俗化、口语化的特色上更有其代表性。这是一首长篇叙事诗，此诗很明显是从汉乐府的《孔雀东南飞》脱胎而来，但是又正如诗人说的，“取其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记叙的是对曾祖母的怀念之情，亲情世态，土俗乡情，通过近似口语的语言，写得曲折详尽，语语都在情理之中，亲切感人。但必须指出，在黄遵宪的诗歌中，除了象《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度辽将军歌》这类汲取一些方言口语或流俗语入诗的作品外，还有不少作品却以使事用典擅长，特别一些近体诗，语言典雅，典故连篇。诚然，这种情况的出现，反映了改良派诗人提倡“诗界革命”的不彻底性，他们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努力改革诗歌，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又使他们无力完全改变诗坛的现状。其实他们也并不想完全改变现状。梁启超就曾说：“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②然而，正是由于黄遵宪等“新派诗”诗人的提倡和实践，为五四时期白话诗的出现起了先驱的作用。

（四）

黄遵宪自己编定的诗集有二：一是《人境庐诗草》，一是《日本杂事诗》。《人境庐诗草》是编年诗，始编于光绪十六、七年，即诗人任驻英使馆参赞期间，共四卷，收作品“二百篇”，编选的目的，正如他所说：“四十以前所作诗，多随手散佚，庚辛之交，随使欧洲，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荟萃成编，藉以自娱”^③。光绪二十八年在家居闲居时，

